

伪劣茶叶与近代中国茶叶出口衰落再认识^{〔*〕}

——以对英国出口为中心

刘章才

(天津师范大学 欧洲文明研究院, 天津 300387)

〔摘要〕伪劣茶叶问题在中国古代长期延续,至近代时期随着中西茶贸易的发展而蔓延至欧洲,英国作为主要的茶叶消费国自然难以避免且英国人自身亦进行掺假制假,这在英国当时食品安全状况不佳的背景下实属常态,不过,随着英国针对食品掺假造假不断加大治理力度与在印度进行的种茶制茶事业日益发展,英国人开始大力渲染中国的伪劣茶叶问题,塑造了中国茶叶几乎等同于伪劣茶叶的话语,这对中国茶叶的出口衰落产生了重要影响。概而观之,英国进口的中国茶叶中存有伪劣产品既是客观存在,亦在特定背景下被有意识地利用为污名化手段,其背后是随着印度茶业的崛起英国人在本国市场中打压中国茶叶的隐蔽意图。

〔关键词〕伪劣茶叶;中英茶贸易;印度茶业;中印茶叶竞争;污名化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4.07.016

近代中国茶叶出口衰落为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1〕}相关成果对此多有探讨且将伪劣茶叶问题视为关键影响因素之一。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陈慈玉对近代中国茶业发展进行了系统探讨,从国际竞争的角度指出英国资本的转移决定了中国茶叶在国际竞争中的历史命运,但对伪劣茶叶产生的影响还是给以肯定,认为这造成“使市场为外国茶所侵夺,导致中国茶业及其生产者的不幸之命运”。^{〔2〕}进入 90 年代,于良子专门对伪劣茶叶问题给以梳理,认为明清时期“茶的对外贸易的兴盛也为作伪者提供了良好的机遇”,而伪劣茶叶泛滥又成为导致近代中国茶叶出口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3〕}稍后,陶德臣在对近代中国茶业历史命运的论述中特别探析了伪劣茶叶的消极影响,“严重降低了茶质,阻碍了茶业技术进步……滋长了弄虚作假的投机心理……败坏了华茶声誉,迫使市场萎缩,加速了茶业的衰败”。^{〔4〕}伪劣茶叶为影响近代中国茶叶命运的重要因素之一,该观点日渐得到学界认可并不断加以详细阐述。比如新世纪以来的相关研究中,仲伟民探讨中国茶叶在国际贸易中何以由盛转衰时,详述的原因之一即“以次充好、假货充斥”;^{〔5〕}宋时磊指出茶叶掺假问题引起中英双方的重视,

作者简介:刘章才,历史学博士,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为茶叶世界传播史与世界近代史。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视野下的西南茶马古道文献资料整理与遗产保护研究”(20&ZD229)的阶段性成果。

“特别是英国推出了一系列治理措施,成为中国茶叶出口衰落的重要诱因”。^[6]

概而观之,现有研究揭示了伪劣茶叶问题与近代中国茶叶出口衰落之间的关系,将其视为导致出口衰退的重要原因之一。不过,由于时代所限抑或研究旨趣所在,现有研究关注的时段尽管多称之为“近代”,实则聚焦于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期,此时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上的衰落之势已经暴露无遗,伪劣茶叶问题很大程度上使得中国茶叶出口衰退积重难返,但进一步观察可见,中国茶叶的颓势此前已有明显呈现,在英国这一最重要的国际市场中中国茶叶出口数量于1874年达到149,900,000磅后,难以继续增长,而印度茶叶却开始逐年剧增,二者对照“不难发现1875年是中印茶叶在英国市场竞争发生转折的一年”,^[7]伪劣茶叶问题与这一关键转折存有怎样的关系?再者,就观察视角而言,现有研究主要基于中国本身来把握伪劣茶叶对中国茶叶出口衰落的影响,但是,茶叶在该历史时期已经成为世界商品,故而需进一步拓宽视野,将其放置于更加广阔的世界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有鉴于此,笔者拟对19世纪80年代之前英国的相关状况进行系统探讨,一方面因为自18世纪末期英国即在中西茶贸易中处于垄断性地位,^[8]英国市场具有风向标意义;另一方面在于该时期世界历史的重要特征即处于“不列颠治世”(Pax Britannica),英国凭借工业优势与海上霸权占据了世界霸主地位,茶叶这一世界商品的历史命运与英国人的作为密不可分。希冀笔者在已有成果基础上的这一延伸,有助于丰富对近代中国茶叶出口衰落原因的探讨,不当之处尚请方家指正。

一、伪劣茶叶问题的产生与发展

伪劣茶叶问题,尽管在近代时期颇为引人注目,但这一现象的历史十分久远,始终与茶叶制作、茶叶贸易如影相随,堪称长期存在且难以治理的老大难问题。

在中国饮茶的早期历史发展中,因为饮茶并不普遍且相关资料极为有限,伪劣茶叶问题未见记述,但至唐代陆羽在撰写《茶经》之时,已然提到茶叶制作存在“采不时,造不精,杂以卉莽”现象,^[9]伪劣茶叶问题初现端倪。延至宋代,茶叶市场的规模已然相当可观,伪劣茶叶问题明显较为严重,从业者采用的作伪方式首先为“冒充法”,即将非茶树的叶子假冒为茶叶、将质量低劣的茶叶冒充为名优者;其次为“掺杂法”,即将劣质茶叶掺入优质茶叶中、将假冒茶叶混入真正的茶叶中;最后为“面饰法”,即通过染色手段使得劣质茶叶呈现出优质茶叶的假面目。^[10]伪劣茶叶问题日趋严重,甚至引起宋徽宗赵佶的关注,他在撰写《大观茶论》时述及“有贪利之民,购求外焙已采之芽,假以制造,研碎已成之饼,易以范模”。^[11]虽然政府采取措施予以打击,“开宝中,禁民卖假茶,一斤杖一百,二十斤以上弃市。”^[12]但是,最终的治理成效难言令人满意,百姓为了生计铤而走险者不乏其人。

明清时期,伪劣茶叶问题在相关典籍中同样多有记述。明代茶马贸易较为繁盛,使得茶叶的市场需求量极大,伪劣茶叶问题随之而起并引起朝廷的关注。《大明实录》给以如此记述:“湖南多假茶,食之则刺口破腹,番族因此不来纳马,此湖茶之不利于番族也。”^[13]伪劣茶叶损害茶马贸易的进行,事关国家安全,官府屡屡予以严查并严厉处罚。比如嘉靖二十六年:

议准:各处茶商有原无资本,混报茶批入山,通同园户蒸造假茶,及将验过真茶盗卖,沿途采取草茶纳官,各至五百斤以上者,商人园户及知情转卖之人,民发附近卫分,军发边卫,各充军,止终本身,茶价入官;不及前数者,依私盐法论罪,仍枷号两个月发落,窝顿店户,知情者从重论;至一千斤以上,本犯发极边卫分,永远充军,店户不问知与不知,一体治罪。^[14]

延至清代,伪劣茶叶问题同样不乏记述。比如《康熙朝大清会典》规定,“造假茶五百斤以上者,本商并转卖之人俱问,发附近,原系腹里卫所者发边卫,各充军店户窝顿一千斤以上,亦照例发遣,不及

前数者问罪照常发落”。^[15]不难看出,尽管其程度与规模可能有所差异,但伪劣茶叶问题在明清时期无疑是长期存在的。

随着历史的发展,伪劣茶叶问题已然不限于中国,因为中西茶贸易的萌生与不断扩大,伪劣茶叶亦出现于西方。自荷兰人于17世纪以“以货易货”方式真正开启中西茶贸易以来,茶叶作为极具异域特色的东方饮品在西方逐渐传播,英国更是后来居上,茶叶消费在社会上层流行开来后不断向下渗透,“至18世纪末期饮茶在英国社会基本普及”。^[16]伪劣茶叶与前述过程如影相随,资料显示,英国国会在18世纪初期即关注到市场中存在伪劣茶叶问题,1725年6月24日,通过了较早的针对在茶中进行掺假的相关治理法令,但效果不尽人意,遂于1731年再次通过相关法令,其导言中还特意述及:

不法之徒经常进行染色、制假,或大批地将黑刺李树叶、甘草叶子、已然饮过的茶叶……模仿着茶叶的样子,用棕儿茶(terra japonica)、蔗糖、糖浆、粘土、洋苏木及其他原料进行掺假或染色,如同真茶一样进行售卖,有碍于陛下臣民的身体健康,损减了国库收入,影响了诚实贸易的商人的利益,因此予以颁布。^[17]

该法令实施之后,有不法分子被发现并因而受到惩罚,比如一位居住于米诺利斯区的犹太商人,被发现以每磅3先令9便士的价格售卖了173磅染色茶叶,因而按照每磅罚款10镑给予处罚。^[18]不过,英国市场上的伪劣茶叶问题并未因此得到遏制,1777年6月24日生效的新法令显示,掺假依然弥漫于茶叶运送与售卖过程中的各个环节,不法分子的手段花样百出,“黑刺李树叶、岑树树叶、续骨木树叶及其他各种树木、灌木抑或植物的叶片,成批地进行染色与加工,仿制成茶叶”。^[19]尽管英国议会一再通过相关法令,但伪劣茶叶问题显然未能得到遏制,议会下院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就此展开调查,其1783年12月的报告中指出:“在英格兰的不同地区,每年由黑刺李树叶与白蜡树树叶制成伪茶,同真茶掺在一起,其数量超过了400万磅。”^[20]此时,英国东印度公司每年在市场上销售的“真正的茶叶”(genuine tea)不超过600万磅。^[21]伪劣茶叶在整个市场中的占比可谓惊人!

尽管英国人制造的伪劣茶叶数量较多,此举导致市场上“茶叶”大量增加,这可能影响到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进口茶叶,但该时期茶叶消费的迅速增长使得贸易形势极为乐观,英国茶叶进口量在较长时期内均呈攀升趋势:1711年购茶量为156,236磅,1721年为282,861磅,1731年为971,128磅,1741年为1,379,294磅,1751年为2,710,819磅,1761年为2,862,773磅,1771年为6,799,010磅。^[22]在英国议会于1784年通过《减税法案》(The Commutation Act of 1784)之后,茶税由超过100%直接降至12.5%,使得欧陆各国向英国走私茶叶无利可图,由此“导致欧陆各国的对华茶叶贸易走向衰落……有助于英国在中西茶贸易中夺得垄断性地位”,^[23]中英茶贸易进一步攀升,至18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与私商该年度共计售茶23,393,645磅,^[24]增长幅度相当可观。该时期伪劣茶叶问题日趋严重与英国从中国购买茶叶数量的迅速攀升并存,前者对后者并未构成阻碍,遑论导致中国茶叶出口的衰落。

二、伪劣茶叶问题在英国的泛滥

在19世纪,伪劣茶叶问题在英国市场上进一步泛滥。生活于伦敦的德国化学家阿卡姆(Fredrick Accum)对食品安全问题给以特别关注,于1820年发表小册子《论食品掺假与厨房毒药》。阿卡姆认为,将对身体健康有害的树叶仿制成茶叶并非新近的“发明”,根源主要在于政府征收重税产生的刺激,使得不法分子毫不迟疑地通过制造伪劣茶叶来获取财富,对此举导致的健康风险乃至生命安全问题毫不顾惜。^[25]或许不法分子因此受到了一定的惩罚,但他们从中获取的利益足以弥补其“损失”。^[26]伪劣茶叶之所以产生毒性,主要在于使用了黑刺李树叶,“我们的‘茶叶’均由黑刺李叶制

成”，^[27]认为这种植物在加工成“茶叶”的过程中变得具有毒性，他还借助伦敦林奈学会会长詹姆斯·史密斯关于英国植物的著述给以证明，“据说这种干叶（黑刺李树叶）被用来替代茶叶，或许仅仅在我国将之与茶叶混合起来，它可能是被证明有毒的主要原因之一，羽毛和樱桃族（plum and cherry tribe）植物的绿色部分均有剧毒，只是作为泻药使用堪称幸运。”^[28]为了使人免于受骗，阿卡姆在书中详列了自己掌握的售卖伪劣茶叶的杂货店，还详述了鉴别伪劣茶叶的基本方法。^[29]

阿卡姆的著作应当说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但伪劣茶叶问题并无明显改善。1843年，供职于国内税务局的官员乔治·菲利普（George Phillips）参与了多起伪劣茶叶案件的调查工作，发现问题依然十分严重：

1843年，仅伦敦一地就存在8家工厂，用于对饮过的、已无营养的茶叶重新进行焙干，此外，本地区还有许多（其他）地方也是如此作为。其操作流程具体如下：受雇佣者在旅店、咖啡馆及其他地点，按照每磅2.5至3便士的出价收集残茶，然后运至加工厂，将之与树胶的溶液混合起来，之后进行焙干。此后假如制成红茶的话，将变干的叶子与玫瑰粉剂（rose pink）以及黑铅（black-lead）混合起来，粉饰其表面——恰如贸易中称其为“红”茶（black tea）。^[30]

当然，伪劣茶叶不仅仅是英国相关人士制作的结果，资料表明亦有相当部分是中国从业者所为。著名医生哈塞尔（Arthur Hill Hassall）深入进行调查，最终于1857年出版了小册子《探测掺假》，详述了自己发现的各种各样的茶叶掺假方法，其中特意提及“在英国国内与中国均是如此”。^[31]《探测掺假》列举的中国制造伪劣茶叶的方式主要有三种：其一，将茶叶与其他树木的叶子制成的“茶叶”混合起来；其二，完完全全的“伪茶”（Lie Tea）；其三，利用各种染色材料对茶叶进行染色。^[32]大致同一时期，美国商人奈伊（Jideon Ney）提供的另一材料，具体呈现了中国从业者如何制作伪劣茶叶。奈伊在来华贸易时，曾亲自参观距离广州约五公里的一家茶叶工场，目睹了中国茶工所进行的整个加工过程，看到火炉上放置着一排平底铁锅，茶叶投入其中进行炒制，其中一个锅中撒入了姜黄粉（turmeric），另一个锅中放入了由普鲁士蓝与石膏混合制成的蓝色粉末，如此进行“加工”之后，原来还显得颜色暗淡或呈棕色的茶叶转变为令人愉悦的绿色，由此“中国制茶的废弃之物与饮用过的茶叶，变成了珠茶（Gunpower）与熙春茶（Hyson）或者其他种类的出口茶叶”。据说真茶与假茶极难区分，美国的茶叶检测师也会买到假茶，英国商人同样如此。^[33]

不难看出，伪劣茶叶既可能源于中国，也可能是英国本土的加工品，进入19世纪后在英国市场中进一步趋于泛滥。不过，伪劣茶叶问题实际上不足为奇，它只是英国市场上当时广泛存在的食品安全问题的冰山一角。前述《论食品掺假与厨房毒药》与《探测掺假》等广为流传的小册子，尽管对伪劣茶叶问题给以关注，不过这仅仅是书中的一个部分或案例，作者的撰写主旨在于披露当时英国市场上普遍存在的食品安全问题，毫不夸张地说，当时英国人经常消费的各类食品无一幸免。如，英国人饮茶一般会添加牛奶抑或乳制品，^[34]即便茶叶品质良好仍然会遭遇伪劣牛奶问题，牛奶行业中染色、掺水、添加过量的防腐剂等现象十分严重。根据统计，19世纪中叶在伦敦销售的牛奶中一半以上存在染色问题，^[35]即通过添加白垩进行漂白，或者利用姜黄粉乃至胭脂红等染色材料，来迎合消费者的消费偏好，而掺水更是普遍现象。《牛奶杂志》于1871年进行了一项抽样调查，所得结果极不乐观：由声誉颇佳的供应者为两个地区提供的牛奶，样本显示其掺水率为29%与47%。^[36]除了茶叶与牛奶之外，其他商品同样存在严重的伪劣产品问题。恩格斯在考察英国工人阶级生活状况时，曾转述时人观察到的市场中的恶劣现状：

糖里面掺上米粉或其他价钱便宜的东西，照净糖的价钱出卖。制肥皂时剩下的废弃物也掺

上别的东西冒充糖卖。咖啡粉里面掺上菊苣及其他价钱便宜的东西;甚至没有磨过的咖啡里也掺假,而且假货还真像咖啡豆。可可里面常掺有捣得很细的褐色粘土,这种粘土是用羊脂油搓过的,掺在真的可可里简直看不出是假的……胡椒里掺上豆荚磨成的粉末及其他东西。葡萄牙红葡萄酒干脆就是假造的(用颜料、酒精等制成),因为大家都知道,单是在英国喝掉的葡萄牙红葡萄酒就比整个葡萄牙所生产的还要多。在市面上行销的各种各样的烟草里都掺上了各种令人作呕的东西。^[37]

概而言之,尽管伪劣茶叶问题在进入19世纪后仍颇为严重,甚至进一步呈泛滥之势,但伪劣产品为各类食品乃至当时英国市场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伪劣茶叶只不过是当时整体状况的一个缩影,其严重程度难言更为突出。

三、英国人对伪劣茶叶的特别关注

与上述伪劣茶叶问题在英国的泛滥相伴的是中英茶贸易快速增长,伪劣茶叶并未明显地影响到贸易发展,但此时英国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变化,当其影响显现之时,伪劣茶叶问题即受到特别关注。

19世纪(尤其是中前期)是英国食品安全问题非常突出的时期,亦是社会各界愈发认识到其危害并着力进行治理的时代。面对严重的伪劣产品问题,英国社会日益认识到其对国民健康造成严重危害,议会开始不断付诸行动,尤其是1855年议会下院成立了专门针对掺假问题的委员会,主要针对食品与药品市场中存在的问题展开全面调查,结果表明普遍存在掺假现象:

主要的商品证明普遍存在或多或少的掺假:竹芋粉中掺着土豆或者其他淀粉;面包掺着土豆、熟石膏、明矾和铜硫酸盐;“水果与蔬菜罐头”(bottled fruits and vegetables)加入了某些铜盐;咖啡掺入了菊苣以及烘烤的小麦、豆类、芒果;菊苣掺入了烘烤小麦、胡萝卜、锯末和威尼斯红;可可掺入了竹芋、土豆粉、糖菊苣和一些有害的红色土;辣椒掺入了磨碎的米、芥末壳等等,还用红铅、威尼斯红和姜黄染色;杜松子酒中掺着天堂椒、硫酸和辣椒;……^[38]

在广泛收集证据并加以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英国议会于1860年制定并通过了首部《食品与饮品掺假法》(*Adulteration of Food and Drink Act*),这很大程度上标志着政府开始摒弃以往所崇尚与秉持的自由放任原则,正式承担起维护食品安全的责任,但由于该法案属于非强制性法律性质,执行力度有限,食品掺假制伪问题之后未能得到明显改善。

不过,国家理应承担治理食品安全问题的责任这一意识已然较为牢固地确立起来,《食品与饮品掺假法》(1860年)所存不足成为进一步展开治理的契机,英国议会在1872年加以修订,至1875年将其扩展为《食品与药品销售法》(*Sale of Food and Drugs Act*),此处“食品”的明确含义为“人类食用或饮用的所有物质”,^[39]茶叶、咖啡等饮品自然包含在内,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该法令各个条款提及食品(Food)或药品(Drug)时均为统称,唯一明确提及具体名称的商品即“茶叶”(Tea),其中第30条“进口时由海关检查茶叶”为针对茶叶的特别规定,具体内容为:

自1876年1月1日起,作为商品进口且在英国任何一处港口卸货的茶叶均须接受海关专员委任的工作人员进行的检查,并经财政部批准,以进行检验与分析,检验员认为有必要时,应采取措施,并以所有方便的方式由指定的分析员进行检查;如果分析后发现其与其他物质或废茶混合,则除非获得上述专员的批准,并按照他们认为是合适的条款和条件,不得将其交付、用于家庭消费或用作船舶储存或出口;但如果在进行检查和分析时,分析员认为该茶不适宜作为人类食品,则应按照上述专员指示的方式没收、销毁或以其他方式处置该茶。^[40]

法案中设有专门的针对性条款,表明茶叶虽然仅为安全问题较为严重的商品之一,但被单独挑选出来给以特别对待,其原因可能主要在于“希望把这些掺假责任转移给其他国家的商人”,因此伪劣茶叶被认为是“由中国进口的”。^[41]

不难看出,《食品与药品销售法》(1875年)针对茶叶的专门条款无视英国商人制造伪劣茶叶这一事实,实际上将责任单独推向中国商人,其中暗含着针对中国茶叶而为之的意图,如此作为很大程度上缘于这一历史时期英国在印度进行的茶叶种植与制作取得了巨大成功。

自18世纪后期饮茶在英国社会日渐普及始,英国人即开始探索发展种茶制茶事业。1788年,英国皇家学会会长班克斯(Joseph Banks)受贸易委员会主席霍克斯伯里爵士(Lord Hawkesbury)所托,就茶树种植进行了分析与展望,他根据收集到的关于茶树特性的文献加上自身丰富的博物学经验,指出“印度东部必然为茶的适宜生长地,加尔各答植物园位置颇佳,适于培育”。^[42]英国政府对此意见颇为重视,因而派遣马夏尔尼使团访华时特意布置了获取茶树的任务,马夏尔尼等人在通过运河经过江南地区之时,恰好看到茶园广布,遂借机“购其数株……意将携往印度孟加拉国种之”。^[43]不过,因为英国东印度公司作为印度的实际控制者,此时通过买卖中国茶叶即可以获取巨额利润,无意致力于茶树种植与茶叶制作,这导致使团移植的茶树不仅未能为产业发展打下基础,甚至最后不知所终。进入19世纪之后,自由贸易原则在英国社会中日益得到广泛认可,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权成为千夫所指,已然难以为继,议会在1813年取消了其对印度的贸易垄断权,继而在1833年通过了《中国与印度贸易管理法》,终结了其对华茶叶贸易垄断权。东印度公司不得不适应形势的不断变化,对在印度发展茶叶种植开始真正发力,所派遣的冒险家戈登潜入中国福建武夷山等地,购买了大量的中国茶树(茶籽)运至印度进行种植,^[44]印度的种茶制茶事业开始起步。

此后,鸦片战争的爆发进一步推动了英国人重视种茶制茶事业,这又与清廷的“以茶制夷”之策产生的影响有关。长期以来,中国在国际茶叶市场中几乎为唯一的供给者,清廷对此十分清楚。1793年,乾隆皇帝在给英王的回信中即述及,“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磁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恩加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45]类似看法在清廷长期延续,至1809年,两广总督张百龄上奏时更进一步,乃至认为英人离开茶叶则病,“茶叶大黄二种,尤为该国日用所必需,非此则必生病,一经断绝,不但该国每年缺少余息,日渐穷乏,并可制其死命”,^[46]延至鸦片战争之时,林则徐仍抱有类似看法,“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47]因此,清廷在鸦片战争时期曾采取中止中英贸易的措施,其中明显蕴有“以茶制夷”的意图,此举一定程度上打击了英国,英国人对此策略不能不给予反应,其后续的应对之策之一即在印度大力推动种茶制茶事业,试图借此打破中国在茶叶供应中的垄断地位,从而将茶叶贸易置于对其而言更为安全的基础之上。时人罗宾逊对此认识深刻,他在1841年时明确指出,“我们掌握了它(茶叶种植与制作),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将中国长期垄断的贸易掌控在自己手中”。^[48]在此后较长时期内英国人坚持予以推进,甚至东印度公司还雇用了植物猎人福钧(Robert Fortune)为其服务,此人来华先后潜入浙江、安徽、江西与福建等地茶区,不仅移植了大量茶树苗与购买了相当数量的茶籽,还聘请了熟练茶工并携带了制茶工具前往印度。^[49]英国人通过不断努力最终使得印度茶业步入大规模发展阶段,出口数量迅猛增长。至1852年,印度出口至英国的茶叶达到232,000磅,此后更是节节攀升,1860年时已经达到1,113,000磅,至1870年更是猛增至13,148,000磅,1875年时进一步增至25,605,100磅。^[50]时人对印度茶叶出口迅猛增长的影响给以深刻揭示,“中国茶叶的销量开始停滞不进,全部增加的数字为印度所独占”,^[51]中国茶叶与印度茶叶事实上形成了此消彼长的竞争关系。

不难看出,此时英国人已经不再完全依赖中国供应茶叶,甚至中国茶叶已然变为印度茶业发展的阻碍,因为后者完全控制在英国人手中,1875年出台的《食品与药品销售法》包含有专门的针对茶叶的条款,而且将制造伪劣茶叶的责任指向中国,实非偶然。

四、中国茶叶在英国遭遇污名化

英国人大力推动印度茶业的发展,使得印度茶叶产量迅猛增长,国际市场几乎完全依赖中国供应茶叶的局面已然被彻底打破,既然中国茶叶可以被印度茶叶替代甚至如此一来对英国更为有利,于是英国市场上司空见惯的掺假制伪问题,在茶叶这一特定商品上变得不再寻常。

就英国当时的社会环境而言,18世纪至19世纪中前期,英国社会对中国文化的态度有一重大转折。在18世纪较长的时间内,欧洲曾一度流行中国风,欧洲人对中国给以想象与美化,塑造出了一个历史悠久、道德高尚、政治开明、宗教宽容的他者形象,众人对中国人的文化情趣与生活方式心驰神往,模仿中国风一度成为社会潮流,茶叶、丝绸、瓷器甚至漆器受到极大欢迎乃至吹捧,修建中国式园林及其他特色建筑也成为时髦做法。但至18世纪下半叶,“中国热”在欧洲逐渐降温,尤其是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增进了西方对中国的实际了解,进一步推动了英国由“崇华”向“贬华”的转变。与此同时,中英双方的经济冲突日益凸显。随着中西贸易不断发展,茶叶日益成为西方尤其是英国输入的关键性商品,但中国对西方商品的需求极为有限,所以英国人不惜通过售卖鸦片扭转局面,鸦片战争也由此爆发。在英国,尽管部分人士对因为鸦片而发动战争给以谴责,但社会主流不仅不以之为耻,反而将吸食鸦片视为华人道德低下的体现,嗜好毒品被塑造为中国人的民族特性,“英国人的内疚之情与其帝国主义式的厌恶中国之情交织在一起。”^[52]

英国社会的这一变化,加上此时中国茶叶已经可以被印度茶叶替代,所以英国市场上常见的“掺假制伪”问题涉及中国茶叶时变得别具意味,各类宣传中开始将中国茶叶与伪劣茶叶几乎等同起来,中国茶叶遭遇严重的污名化。

这种对中国茶叶的贬抑,鸦片战争之后很快就有明显显现。1851年,在伦敦举行的首届世界博览会上,官方的展品目录手册中对茶叶给以详细介绍,最后部分特别提到茶叶掺假染色问题:

沃林顿先生呼吁关注对茶叶给以粉饰所用的方法,缘于购买者对其偏于黯淡的天然黄绿色不甚满意,因此,中国人用普鲁士蓝(Prussian Blue)、姜黄以及纤维石膏,将茶叶染为蓝绿色。沃林顿先生近来又注意到新的掺假行为,将茶粉(tea-dust)用树脂粘合起来,用普鲁士蓝、姜黄以及很大比例的纤维石膏粉饰其表面;红茶则用土状石墨或黑铅粉饰。掺假如此严重,尽管“真茶”(genuine teas)中灰渣(ash)只占5%至6%,但伪造的圆珠茶中占到了34%至45.5%,花茶中灰渣占比5.5%,但伪造花茶中则占到了22.5%。^[53]

伦敦世界博览会开幕时有50多万人聚集于其举办地海德公园,至闭幕时共计6,039,159人进行了参观,水晶宫迁址后每年还有约200万人参观,^[54]其影响之大可谓难以估计,尽管阅读官方手册中茶叶染色掺假相关内容的人数不可考,但官方手册的这一做法,一味地将伪劣茶叶问题归咎于“中国人”,无视前文提及的英国国内大量制造伪劣茶叶的事实,难脱别有用心之嫌疑。

上述博览会官方手册的做法不过为英国社会舆论的缩影,该时期以及此后较长时间,英国大量的小册子与广告都在极力塑造印度茶叶纯正健康的形象,中国茶叶则为与之形成对比乃至反衬的伪劣产品。格雷于1857年所辑录的政府记录中,提及印度茶叶时吹嘘,“没有染色物质在任何一家工厂中使用”,^[55]《德比郡时报与切斯特菲尔德先驱报》刊文认为:

茶叶消费者越来越反对中国人给茶上色的做法……公众将非常高兴地了解到,最近又有许多纯净、非染色茶叶到来,由“印度女皇号”及其他船只运输。购买者最好记住,纯正的绿茶呈暗淡的橄榄色而不是接近蓝色,纯正的红茶并不是非常黑的颜色。^[56]

“茶叶批发经销商”于1873年11月15日写给《泰晤士报》编辑部的信件中,提及对这一社会舆论的观察,“对印度茶叶和中国茶叶的特点加以概括,即你们的一些记者认为,所有的印度茶叶都是好的,而所有的中国茶叶都是坏的。”^[57]甚至在“工艺协会”(The Society of Arts)于1874年1月23日举行的关于印度发展的会议上,长期负责大吉岭地区茶业发展的坎贝尔认为,“显然只有在中国才会发生(茶叶)掺假,只有追溯到这一源头并防止从中国运出才会有用。”^[58]贬抑中国茶叶的状况此后仍在延续。比如,《自由教会月刊》1882年4月1日登载的茶叶广告,指明伦敦市场小巷69号销售“纯净的印度茶叶”,“印度茶叶从不掺假,所以比其他茶叶更为优良与经济,直接源于印度茶园,纯净而地道。”不仅如此,还特别援引了《泰晤士报》1881年7月27日对印度茶业进展的认识,“印度可以种植优于中国的更好的茶叶”,借此来增强说服力,凸显印度茶叶具备更为优良的品质。^[59]《教会倡导者》同年8月1日刊登的哈提巴里茶叶公司(The Hattibarree Tea Company)的广告,同样大力宣传售卖“纯净的印度茶叶”,鼓吹产品完全源自公司在阿萨姆的种植园,设在都柏林的部门,每月接收从加尔各答驶来的汽船所运输的茶叶,提供给公众的产品为原箱原货,还特别强调没有掺入任何中国茶叶,保持了离开印度茶园时的本初状态。^[60]贝尔登(Samuel Baildon)在其小册子《印度茶业》中,对印度所产茶叶更是大肆吹嘘,“在英国出售的每一磅(印度茶叶)都可以保证绝对纯正,这是它在业界的声誉所在;在大量的调查过程中,唯一与人们对其纯净的普遍认可不相吻合的背离,是一个非常容易解释的小问题:在一些碎茶中,偶尔会发现木炭碎屑”,而中国茶叶在其记述中可谓糟糕透顶,“很多情况下被宣布掺入了有害物,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毒物”。^[61]

中国茶叶一定程度上存在染色制伪问题为历史事实,但该时期这种流行性贬斥话语显然存有片面或者夸大的倾向。如果较为全面地检视当时的状况,不难发现亦有较为客观的观察或者评论,有作者认为“在中国与我国,茶叶均有相当数量的掺假问题存在……尽管在中国进行了一定数量的掺假,如果把责任完全归于他们是不公正的,邪恶起源于我们并且仍然依赖于我们而存在,这完全是由于我国商人之间的竞争。”^[62]还有作者坦承,英国人在印度进行的茶叶种植与制作,同样未能完全避免出现伪劣茶叶问题,“(印度)阿萨姆生产的数种优良的茶叶已经进入我们的市场,这些种植园生产与输入进来的工夫茶、小种茶、白毫花茶到目前为止都是真茶。然而,我们遗憾地观察到,过去数个星期中一定数量的人工染色绿茶从印度茶叶种植园,输入进来。”^[63]不仅如此,有目击者甚至观察到在中国与印度之外亦存在制造伪劣茶叶的现象。《晨邮报》1874年1月12日刊登的文章《茶及其产品》,观察到如此现象:“不久之前,一位英国牧师与他的妻子在瑞士时看到一些孩童从树篱上采摘叶子,问他们这是在做什么,得到的回答是:‘我们在为英国采集茶叶(tea)’。”^[64]这一事例表明,瑞士可能存在制造伪劣茶叶的情况并且最终将之输入英国市场。

不过,此类评述或者报道数量较少,完全被污名化中国茶叶的话语所淹没,中国茶叶在英国的形象已然发生蜕变,从令人艳羡的中国风饮品,变为等同于伪劣茶叶乃至危险的有毒物,印度茶叶则从无到有,而且凝聚了英国人强烈的民族情感,被塑造为“纯正”“无掺假”的自己的茶叶,二者形成鲜明对比。对此问题,晚清的有识之士即有所揭示。清政府为了挽救茶叶出口危局,曾于1905年派遣郑世璜考察团赴印度与锡兰进行系统考察,他们敏锐地发现:“近来英人报章,借口华茶秽杂,有碍卫生,又复编入小学课本,使童稚即知华茶之劣,印锡茶之良,以冀彼说深入国人之脑筋,嗜好尽移于印锡之

茶而后已焉。”^[65]稍后,福建商务议员吕渭英分析中国茶叶的衰落时亦指出,“揆其失败之原因实缘西人以民族主义行之于茶业……其居心之险,手段之辣,不至华茶绝迹欧市不止”,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反制之道,“虽然彼能以民族主义抑我之销场,我奚不能以民族主义复我之名誉乎”。^[66]可以说,时人已经认识到伪劣茶叶问题潜藏着英国人出于竞争考量,而对中国茶叶进行的污名化,甚至揭示了该问题背后关联着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还有针对性地提出以“我”民族主义对抗“彼”民族主义,力图借此恢复中国茶叶的名誉,提升其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不过,此时清朝已日薄西山,全球处于“不列颠治世”的格局之下,这些有识之士提出的对策难以实施,遑论取得具体成效,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的衰败状况日甚一日。

综上所述,伪劣茶叶问题在中国古代的确长期存在,随着中西茶叶贸易的发展,该问题逐渐蔓延到欧洲。英国作为主要的茶叶贸易国与茶叶消费大国,自然受到影响,英国的茶叶从业者自身亦制假贩假,而这很大程度上为英国当时并不完善的市场环境中的“常态”。不过,随着英国针对食品掺假造假不断加大治理力度尤其是英国在印度进行的种茶制茶事业的日益发展,中国伪劣茶叶问题被英国舆论大加渲染,乃至形成了将中国茶叶几乎等同于伪劣茶叶与以中国茶叶之“劣”反衬印度茶叶之“优”的话语,中国茶叶在英国市场自然被摒弃进而逐渐失去了以往的国际地位。

探讨这一问题可见,以今日的常识(伪劣产品会影响商品出口)作为分析历史问题的认识基点,可能无形中屏蔽了历史本身的复杂性以及历史事件更为深层的关联,对此须给以足够的警惕,同时亦印证了学界所倡导的研究中国历史相关问题将其放置于更广阔的世界背景中的必要性,^[67]以此取径且沿着这一方向不断探索,相信有助于更好地实现“打破学科壁垒、跨越学术鸿沟,在促进中国史与世界史的有机融合中,达到追求真知的新高峰”的学术愿景。^[68]

注释:

[1]该方面学界已有较多关注,如林齐模:《近代中国茶叶国际贸易的衰减——以对英国出口为中心》,《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仲伟民:《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康健:《全球史视野下清代中后期徽州茶商的际遇》,《学术界》2024年第2期。

[2]陈慈玉:《近代中国茶业之发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74页。该书最初于1982年出版,本文所引为再版本。

[3]于良子:《伪劣茶考析》,《中国茶叶》1993年第4期。

[4]陶德臣:《伪劣茶与近代中国茶业的历史命运》,《中国农史》1997年第3期。

[5]仲伟民:《近代中国茶叶国际贸易由盛转衰解疑》,《学术月刊》2007年第4期。

[6]宋时磊:《近代中英茶叶贸易的质量问题及其治理》,《全球史评论》2016年第2期。另需说明的是,该论述及英国人对中国茶叶加以丑化,但因旨趣所在并未展开。

[7]林齐模:《近代中国茶叶国际贸易的衰减——以对英国出口为中心》,《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

[8]关于英国在中西茶贸易中逐渐占据垄断性地位的过程,详见刘章才:《“奇迹般的商品”:18世纪中英茶贸易述论》,《海洋史研究》2018年第1期。

[9]吴觉农:《茶经述评》,北京:农业出版社,1987年,第1页。

[10]陶德臣:《论宋代伪劣茶问题与官府的法律应对》,《广东茶业》2013年4月。

[11]赵佶:《大观茶论》,朱自振、沈冬梅、增勤编著:《中国古代茶书集成》,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年,第125页。

[12][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光绪七年刻本,第20页。

[13]《大明实录·大明神宗显皇帝实录》卷三百八,万历二十五年三月甲辰。

[14]《大明会典》卷三十七,万历十五年刻本,第17页。

[15][清]伊桑阿等:《康熙朝大清会典》卷一百一十五,第7页。

[16]刘章才:《饮茶在近代英国的本土化论析》,《世界历史》2019年第1期。

- [17][18][22][24] Milburn, W., *Oriental Commerce* (Vol. II), London: Black, Parry & Co., 1813, pp. 537, 537, 534, 541.
- [19] Anonymous, *Advice to the Unwary; or, An Abstract, of Certain Penal Laws Now in Force against Smuggling in General, and the Adulteration of Tea* London, 1780, p. 18. (原材料无出版社信息)
- [20][21][25][26][27][28][29] Accum, F., *A Treatise on Adulteration of Food, and Culinary Poisons* London: Longman, Hurst, Rees, Orme, and Brown, Paternoster Row, 1820, pp. 217, 217, 213 - 215, 220 - 221, 213, 219, 230 - 237.
- [23] 刘章才:《试论英国1784年〈减税法案〉》,《亚洲研究》(釜山)2014年6月,第129页。
- [30][31][32] Hassall, A. Hill, *Adulterations Detected; or, Plain Instructions for the Discovery of Frauds in Food and Medicine*, London: Longman, Brown, Green, Longmans, and Roberts, 1857, pp. 90, 74, 75.
- [33] Ney, J., *Tea: And the Tea Trade*, New York: G. W. Wood, 1850, p. 51.
- [34] 刘章才:《英国茶文化研究:1650 - 1900》,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107 - 111页。
- [35] Atkins, P. J., "Sophistication Detected: Or, the Adulteration of the Milk Supply, 1850 - 1914", *Social History*, Vol. 16, No. 3, Oct. 1991, p. 321.
- [36] 刘金源、骆庆:《19世纪伦敦市场上的牛奶掺假问题》,《世界历史》2014年第1期。
- [37][德]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10页。
- [38][62] *Report from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Adulteration of Food* Ordered by The House of Commons, to be Printed, 22 July 1856, pp. IV, 272.
- [39][40] *Sale of Food and Drugs Act*, <https://www.legislation.gov.uk/ukpga/1875/63/enacted>, 2023 - 1 - 30.
- [41] 魏秀春:《英国食品安全立法与监管史研究:1860—2000》,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71页。
- [42] Sharma, J., "British Science, Chinese Skill and Assam Tea: Making Empire's Garden", *Indian Economic & Social History Review*, Vol. 43, No. 4, 2006, p. 432.
- [43][英]马夏尔尼:《1793乾隆英使觐见记》,刘半农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194 - 195页。
- [44] Gordon, G. J., "Memorandum of an Excursion to the Tea Hills", *Chinese Repository*, Vol. 4, No. 2, 1835, pp. 72 - 82.
- [45][英]斯当东:《英使觐见乾隆纪实》,叶笃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560页。
- [46][50][51] 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75、1193、1190页。
- [47][清]林则徐:《林则徐家书》,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5年,第131页。
- [48] Robinson, W., *A Descriptive Account of Assam; with a Sketch of the Local Geography and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Tea - plant of Assam* London: Thomas Ostell & Co. 1841, p. 141.
- [49] Fortune, R., *A Journey to the Tea Countries of China* London: John Murray, 1852.
- [52][英]蓝诗玲:《鸦片战争》,刘悦斌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5年,第375页。
- [53] Authority of the Royal Commission, *Official Descriptive and Illustrated Catalogue of the Great Exhibition of the Works of Industry of All Nations* Part IV, Colonies - Foreign States, Division I, London: Spicer Brothers, 1851, pp. 872 - 873.
- [54] 于文杰:《伦敦万国博览会及其文化遗产》,《英国研究》2019年第1辑。
- [55] Gray, J., *Selections from the Records of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Home Department) No. XXIII Report upon the Present Condition and Future Prospects of Tea Cultivation in the North West Provinces and in the Punjab*, Calcutta: Calcutta Gazette Office, 1857, p. 75.
- [56] "News", *Derbyshire Times and Chesterfield Herald*, February 7, 1863.
- [57] Wholesale Tea Dealers, "Indian Teas", *Times* November 15, 1873.
- [58] "Meeting of the Indian Section",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ts*, January 30, 1874, p. 180.
- [59] "Advertisement", *The Free Church Monthly*, April 1, 1882.
- [60] "Advertisement", *The Church Advocate*, August 1, 1882.
- [61] Baildon, S., *The Tea Industry in India* London: W. H. Allen & Co., 1882, p. 30. 此处引用中的加粗文字在原文中为斜体,表示强调。
- [63] "Tea", *Glasgow Herald*, July 19, 1870.
- [64] "Tea and Its Production", *The Church Advocate*, August 1, 1882.
- [65][清]郑世璜:《印锡种茶制茶考察报告》,朱自振、沈冬梅、增勤编著:《中国古代茶书集成》,第926页。
- [66]《福建商务议员吕观察渭英申报商部茶木运销情形并筹办法文》,《山东官报》1908年第5期。
- [67] 康健:《全球史视野下清代中后期徽州茶商的际遇》,《学术界》2024年第2期。
- [68]《历史研究》编辑部:《〈中国史与世界史的融合〉编者按》,《历史研究》2020年第4期。